

从职业评价与择业取向看中国社会结构变迁

许 欣 欣

Abstract: The paper reports ratings of occupational prestige and inclinations of choosing occupation by urban residents in 63 cities of China. Using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N=2599) aged above 16 and comparing with several other researches, the author found that ratings of occupational prestige and inclinations of choosing occupation by urban residents reflected the deeply changing process of social structure in China. The change is going on along two axes. One is the axis of marketization; on the one hand, people like occupations of "ti zhi wai" (informality) more and more; on the other hand, occupations of power sections are still looked upon with favor by a lot of people. The other is the axi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ccupations contacting with new knowledge or new technology have begun to lead the new trend of occupational change and social mobility of China. Finally, a series of predictive equations are constructed to estimate prestige scores for all occupations in urban China.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迈向 21 世纪的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经济体制的转轨、产业结构的调整、分配模式的改变以及多种经济形式的形成与发展,造成了大量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与社会资源分配体系的重组。这种社会资源的占有、分配以及分配关系的变动,不仅引发了社会成员间原有利益格局的重大变革,而且导致了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要揭示和把握这一变迁过程及其发展趋势,从人们的职业评价与择业取向着手无疑是最好的切入点。

一、中国城市居民的职业评价

职业声望作为工业化社会核心价值的一种反映,一直被社会学家广泛使用,以从社会层面测量社会结构分化的方向和程度。职业声望由个人声望引申而来,二者都是重要的社会现象。所谓个人声望是指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导致了对他人能力、品质、影响力等方面的评价,众人的综合评价即为被评价者的声望。声望高者受人尊重,声望低者则往往被人轻视。为此,声望提供了社会评价与社会分层的尺度。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组织日益取代家庭成为人们最主要的活动场所,随着人们活动场所的扩大,诸多标志个人在生产组织中身份与地位的职业成了人们最主要的社会地位标志,由职业团体所构成的社会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可以说,在许多方面,职业群体都具备了社会阶层的应有特征:群体内具有较高的同质性,而在不同的职业群体间则存在着较高的异质性,群体之间差异明显。因此,在现代社会中,职业声望便取代个人声望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尺度。

职业声望作为一种社会学研究传统,是以解释社会地位与社会分层关系为其主线的。韦伯是最早提出用声望作为社会分层标准之一的学者。韦伯以后的声望研究从理论上讲仍围绕在声望解释社会分层结构中的意义和功能方面,不过更深入一层。具体来讲,一是对声望进行了经验研究和实际测定(Warner, 1941);二是将社会统计学方法运用到社会分层研究,发展出多种职业声望量表(North and Hatt, 1947; Duncan, 1961);三是将声望研究的成果引入其他专门的社会学领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地位获得模型(Blau and Duncan, 1967)和社会网络理论(Lanman, Blacburn, Plandy);四是通过职业声望进行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差异的比较研究(Treiman, 1977)。这些研究不仅在方法上更加规范,而且从理论上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解释,丰富并拓展了社会分层的研究领域。但总的来讲,以往的职业声望研究多着眼于静态的社会结构分析,本研究则试图运用职业声望量表与未来择业取向相结合的方法,揭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动态过程与发展趋势。

首先让我们来看中国的职业声望量表。为了了解即将步入 21 世纪的中国城市居民如何评价各类职业,笔者于 1999 年 7—8 月在全国 63 个城市对 2599 名 16 岁以上的城市居民进行了一次抽样问卷调查^①(本文中除特别注明外,所有数据均来源于这次调查)。问卷中一共设计了 69 种职业,请被调查者根据各自的主观感觉对所列职业的价值进行评价。每一职业的价值均可分为 5 个等级,并采用美国社会学家诺斯与哈特标准赋予一定的分数,依次为:“最佳职业(100 分)”、“较好职业(80 分)”、“一般职业(60 分)”、“较差职业(40 分)”、“最差职业(20 分)”。将调查结果汇总后,求出每一职业的平均得分,据此作出中国的职业声望量表(见表 1)。

表 1 中国城市居民职业声望量表^② 调查样本: 2599 人

排序	职业	声望得分	标准差	排序	职业	声望得分	标准差
1	市长	92.9	13.71	36	大企业会计	73.4	14.54
2	政府部长	91.4	13.85	37	党政机关一般干部	73.3	15.24
3	大学教授	90.1	13.39	38	私营高科技企业雇员	73.3	15.57
4	电脑网络工程师	88.6	14.08	39	证券公司职员	72.4	14.75
5	法官	88.3	13.94	40	导游	71.7	14.10
6	检察官	87.6	13.90	41	私立学校教师	71.5	14.92
7	律师	86.6	13.39	42	党政机关小车司机	70.1	17.70
8	高科技企业工程师	85.8	13.50	43	文化个体户	68.2	15.91
9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85.7	16.60	44	保险公司职员	67.5	15.83
10	自然科学家	85.3	15.12	45	企事业单位政工干部	66.8	15.70
11	翻译	84.9	14.62	46	工商个体户	65.7	16.64

① 调查样本总体的基本构成情况。1. 性别分布: 男性占 51.4%, 女性占 48.5%; 2. 年龄分布: 16—29 岁者占 24.2%, 30—39 岁占 27.2%, 40—49 岁占 25.3%, 50—59 岁占 13.3%, 60 岁以上占 10%; 3. 受教育程度分布: 小学及以下者占 5%, 初中程度占 22.5%, 高中程度占 21%, 技校、中专、职高程度占 17.1%, 成人高等教育程度占 15%, 全日制大专、大学及以上程度占 19.4%; 4.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占 33.8%, 共青团员占 19.1%, 民主党派占 1.4%, 无党派群众占 45.8%。调查委托国家体改委社会调查系统具体实施。

② 量表中所列 69 种职业在调查问卷中被分为 A、B 两部分,其中 A 卷与 B 卷各含 35 种职业。为进行比较,在 A、B 卷中均设计了一个相同的职业,即“私/民营企业家”。统计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 A、B 卷中“私/民营企业家”的评分非常接近, A 卷(调查样本 1283 人)中该职业的声望得分为 78.62, 标准差为 16.25; B 卷(调查样本 1316 人)中该职业的声望得分为 78.58, 标准差为 16.22。故而,有理由在在经过加权的情况下将 A、B 卷合并构成此量表。

排序	职业	声望得分	标准差	排序	职业	声望得分	标准差
12	税务管理人员	84.9	16.15	47	三资企业职工	65.4	15.05
13	社会科学家	83.9	16.26	48	护士	64.1	14.46
14	医生	83.7	14.38	49	饭店厨师	60.6	16.73
15	计算机软件设计师	83.6	15.77	50	出租汽车司机	59.5	15.43
16	作家	82.5	16.22	51	邮递员	59.1	15.55
17	记者	81.6	15.67	52	公共汽车司机	58.5	14.94
18	房地产经营开发商	81.5	15.72	53	社区服务人员	56.6	16.27
19	国有大中型企业厂长、经理	81.3	16.43	54	股份制企业工人	53.2	15.76
20	投资公司经理	81.1	15.79	55	殡仪馆工人	53.0	22.32
21	歌唱演员	80.1	19.51	56	宾馆服务员	52.6	16.80
22	编辑	79.7	14.33	57	商店售货员	50.8	15.84
23	播音员	79.5	15.83	58	公共汽车售票员	48.7	15.52
24	银行职员	79.1	14.85	59	国有大中型企业工人	47.4	18.17
25	私/民营企业企业家	78.6	16.24	60	环卫工人	45.5	18.54
26	影视剧演员	78.2	19.53	61	农民	44.7	20.74
27	空中小姐	78.0	15.87	62	乡镇企业工人	44.3	18.04
28	工商管理人員	77.3	15.41	63	饭店招待	43.5	16.67
29	电脑网络系统管理员	77.2	15.73	64	国有小企业工人	43.5	17.61
30	国立中小学教师	77.1	14.38	65	私/民营企业工人	43.2	18.31
31	广告设计师	76.7	14.02	66	集体企业工人	42.7	18.11
32	警察	76.2	18.00	67	个体户雇工	37.7	18.83
33	机械工程师	76.0	14.29	68	保姆	36.9	17.48
34	国有小企业厂长	75.9	16.11	69	建筑业民工	34.9	17.86
35	运动员	74.7	17.09				

注:本职业量表在设计时曾得到戴建中、李路路、李培林、李强、沈原的指点,特此致谢。

在职业的选择上主要考虑了四方面原则:一是保证所选职业与其他国内外有关调查具有可比性;二是应为大多数被调查者所熟悉;三是能够揭示出中国社会所独具的一些特征,如所有制类型;四是要使所选职业能够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如“电脑网络工程师”、“计算机软件设计师”、“电脑网络系统管理员”等。

表 1 显示,位于前 21 位的职业得分都在 80 分以上,且除“歌唱演员”的标准差(19.51)较大外,其余 20 个职业的标准差均在 13—16.6 之间,说明中国城市居民对这些职业的共识很高。概括这一组职业的特征,可以看到几个很明显的标志:即政治权威、科学知识、复杂的职业技能和较高的收入。除此之外,具有时代象征的新兴产业似乎也是这组职业的一个特征,如:“电脑网络工程师”(88.6 分)、“高科技企业工程师”(85.8 分)和“计算机软件设计师”(83.6 分),这 3 个具有明显知识经济时代特征的职业得分均远远高于“机械工程师”(76 分)这一典型的属于工业经济时代的职业,尽管其也需要复杂的技能方能胜任。

“市长”、“政府部长”和“大学教授”是声望最高的 3 个职业,得分均在 90 分以上。从这 3 个职业所具有的特征看,政治权力、社会责任和教育水平似乎是中国市民在进行职业评价时最为看重的标准。不过,从“电脑网络工程师”这一自 90 年代以后才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职业竟

能在量表所有 69 个职业中位居第四来看,中国城市居民对明显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兴职业已表现出高度认同。

其次,职业声望在 60 分以上、80 分以下的职业共 28 个,可视为中等声望的职业。概括这一档次职业的特征,其基本上为白领职业,其权力、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均较上一档次要低。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外”的职业也在这一档,如:“私/民营企业家人”、“私营高科技企业雇员”、“私立学校教师”、“文化个体户”和“工商业个体户”等。这说明,中国城市居民的所有制观念已经开始淡化,对于“体制外”从业者的歧视已明显减弱。

得分在 60 分以下的职业共 20 个,以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职业为主。显然,人们对于较少专业训练、较低教育水平、劳动强度大的职业一般评价较低。

不过,有一点在此需要特别注意:在表 1 的职业量表中列出了 3 个职业性质相同,而所有制形式不同的职业,即“党政机关小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和“公共汽车司机”。三者的声望得分呈现出明显差异,声望最高的是“党政机关小车司机”(70.1 分),其次是“出租汽车司机”(59.5 分),声望最低的是“公共汽车司机”(58.5 分)。若论收入,三者之中“出租汽车司机”无疑是最高的,但其职业声望却远远低于工作在党政机关为首长开车的“小车司机”;若论技术难度,开大车的“公共汽车司机”驾驶执照最难考,但其职业声望却位居三同行之末。显然,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收入,不是技术水平,也不完全是劳动强度,而是接近政治权威的距离、工作的稳定性和晋升的机会——事实上,在中国,党政机关秘书与司机擢升之快已是司空见惯。

二、中国不同时期职业声望量表比较

对不同时期调查结果的比较,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表 2 是 4 个不同时期由不同研究人员在中国不同地区所进行的职业声望量表的比较。其中,林楠与谢文的调查完成于 1983 年,整个量表含 50 个职业,全部调查样本均取自北京(Lin & Xie, 1988);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课题组的调查完成于 1987 年,量表共含 85 个职业,调查样本取自北京和沈阳两市(许欣欣, 2000);“中国居民家庭生活调查”课题组的调查完成于 1993 年,整个量表由 100 个职业组成(陈婴婴, 1995),调查样本取自 10 个县(市)(折晓叶、陈婴婴, 1995)。为便于比较,表 2 仅列出 4 次调查中所含相同职业的声望得分。

美国社会学家特莱曼(Treiman, D. J.)在对 60 个国家与地区的职业声望进行比较后发现,由于社会结构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必要性(functional imperative)和组织必要性(organizational imperative)所致,各国/地区对职业声望高低的评价非常接近,其相关系数约达 0.80(Treiman, 1977)。中国的情况亦不例外,4 次调查虽然完成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但通过对各调查所含相同职业的比较可知,声望得分的相关度很高:1999 年笔者对全国 63 个城市 2599 名城市居民的调查与 1983 年林楠与谢文北京市调查的相关系数为 0.87;1999 年调查与中国经济体改所“中国社会分层”课题组 1987 年调查的相关系数为 0.90;1999 年调查与 1993 年“中国居民家庭生活调查”的相关系数为 0.92。

然而,尽管有着较强的相关,调查者对其中一些职业的评价却在不同时期呈现出明显差异。首先,关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评价。在 1999 年笔者所做的全国性调查中,这一职业声望得分为 85.7,高于“自然科学家”(85.3)和“社会科学家”(83.9)等要求专业知识水平较高职业的声望;而在 1983 年该职业声望得分为 68.1,1987 年为 77.7,1993 年为 71.9,均大大低

于历次调查中“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职业声望,并且低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厂长、经理”和“国有小企业厂长”的声望。

表 2 不同时期职业声望量表比较

职 业	笔者 1999 年在全国 63 个城市的抽样调查	林楠与谢文 1983 年调查	中国经济体改所课 题组 1987 年调查	中国居民家庭生活调 查课题组 1993 年调查
市长	92.9		87.9	81.3
政府部长	91.4		82.8	87.0
大学教授	90.1	83.8	88.6	87.6
法官	88.3		80.6	
检察官	87.6			78.4
律师	86.6		84.2	70.8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85.7	68.1 ^①	77.7 ^①	71.9 ^①
自然科学家	85.3	83.8	84.5	75.5
翻译	84.9			67.1
社会科学家	83.9	82.7	83.5	79.2
医生	83.7	86.2	80.9	68.8
作家	82.5	81.7	87.4	67.4
记者	81.6	81.1	83.2	66.2
国有大中型企业厂长、经理	81.3		79.4	76.9
工商/税务管理人员	81.1 ^②		68.3	63.0
歌唱演员	80.1			55.1
编辑	79.7		83.0	65.2
银行职员	79.1		68.7	
私/民营企业企业家	78.6		67.6	58.6
影视剧演员	78.2	57.7		60.0
空中小姐	78.0			56.9
国立中小学教师	77.1	66.4 ^③	70.7	61.4
警察	76.2	43.8	65.7	66.5 ^④
机械工程师	76.0			72.4
国有小企业厂长	75.9		73.6	
运动员	74.7	62.8		60.4
大企业会计	73.4	66.4		60.4
党政机关一般干部	73.3	63.0	65.5	
党政机关小车司机	70.1			59.8
文化个体户	68.2			48.5
企事业单位政工干部	66.8		63.9	67.6
工商业个体户	65.7		62.2	48.3
护士	64.1	55.3	66.7	50.2
饭店厨师	60.6	43.5	68.8	
出租汽车司机	59.5		66.5	50.4
邮递员	59.1	46.3	63.0	42.3
公共汽车司机	58.5	63.2 ^⑤	67.5 ⁵	50.4

职业	笔者 1999 年在全国 63 个城市的抽样调查	林楠与谢文 1983 年调查	中国经济体改所课 题组 1987 年调查	中国居民家庭生活调 查课题组 1993 年调查
殡仪馆工人	53.0		50.2	27.1
商店售货员	50.8	42.1	59.9 ^⑥	33.4
公共汽车售票员	48.7	42.1	53.9	41.5
国有大中型企业工人	47.4		64.8	52.4
环卫工人	45.5	25.9	54.6	28.5
农民	44.7		57.9	28.2
乡镇企业工人	44.3		59.3	43.2
饭店招待	43.5	39.0	58.0	33.2
国有小企业工人	43.5		61.4	
集体企业工人	42.7		59.5	35.9
个体户雇工	37.7			23.0
保姆	36.9	18.9	49.8	19.1
调查样本(人)	2599	1632	753	3012

说明: 1. 此处为原量表中“党政机关局级干部(或司局长、高级官员)”与“党政机关处级干部(或处长、中级官员)”两职业的平均分。

2. 此处为原量表中“税务管理人员”与“工商管理人员”两职业的平均分。

3. 此处为原量表中“中学教师”与“小学教师”两职业的平均分。

4. 此处为原量表中“公安人员”的得分。

5. 此处为原量表中“司机(或汽车司机)”的得分。

6. 此处为原量表中“大商店售货员”与“小商店售货员”两职业的平均分。

其次,“工商/税务管理人员”和“警察”的职业声望在 1999 年调查中也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83 年时,“警察”的声望低于“运动员”、“会计”、“党政机关一般干部”、“护士”、“邮递员”等职业;1987 年,“警察”声望低于“国有小企业厂长”、“护士”、“饭店厨师”、“出租车司机”和“公共汽车司机”;即使到了 1993 年,“警察”的声望也还低于“机械工程师”和“企事业单位政工干部”的声望。但是 1999 年调查则显示,“警察”这一职业声望已明显高于上述那些职业。不仅如此,从表 2 中还可以看到,“工商/税务管理人员”的职业声望上升幅度也很大:1987 年时,“工商/税务管理人员”的声望低于“编辑”、“银行职员”、“中小学教师”、“国有小企业厂长”和“饭店厨师”;1993 年,其声望低于“编辑”、“警察”、“机械工程师”、和“企事业单位政工干部”;而到 1999 年,其声望已明显高于这些职业。

相对于其他职业来讲,在中国,“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工商/税务管理人员”和“警察”这 3 个职业均拥有较大的特权,前者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任职者,后者则是政府重要职能部门的任职者。这 3 个职业声望的显著提高,似乎说明人们在评价职业声望时对职业所拥有的权力特征以及市场机制下职业的稳定性更加看重。

另外,表 2 数据显示,与以前 3 次调查相比,职业声望在 1999 年有较大提高的职业还包括“私/民营企业家”、“歌唱演员”、“影视剧演员”、“文化个体户”和“工商业个体户”。这些职业都属于近年来市场因素渗透较多、收入增长较快的职业。由此可见,经济收入与市场适应力在人们对职业价值进行判断时的作用有了明显增加。

此外,“国立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声望在 1999 年调查中也有较大的提高(与“警察”、“机械

工程师”、“国有小企业厂长”相比)。显然,教育产业的发展、中小学教师收入的提高和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小学教师调动家长权力与资源能力的增强——都为这一职业增添了砝码。

相比之下,国有企业工人的职业声望则在明显降低。1987年和1993年的调查显示,“国有大中型企业工人”的职业声望高于“个体劳动者”、“邮递员”、“售货员”和“售票员”等服务性职业,“国有小企业工人”的声望也在“售货员”、“售票员”、“环卫工人”、“乡镇企业工人”、“饭店招待”等职业之上。然而1999年调查数据却显示,国有企业工人的职业声望在直线下降,已经掉到了这些职业之下。显然,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国有企业下岗工人日渐增多,致使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地位显著下降。

通过比较不难看出,职业的社会经济特征是会发生变化的,人们对于职业的评价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中国,职业声望的升降受制度变迁的影响颇深。

三、不同社会群体的职业评价比较

由于职业声望主要反映人们对某职业的主观看法,不同的人出于自身经历、环境、观念等方面的不同,对于相同的职业往往会产生不尽相同的看法。因此,为了进一步了解不同社会群体对各种职业的评价,下面分别从年龄、受教育程度、城市规模与发展状况等角度对调查样本进行了区分,借以找出不同群体在职业评价上存在的差异。

1. 不同年龄群体的比较

表3是不同年龄群体职业声望评价的比较,评分接近的职业未予列出,表中所列只是差异较显著者。从表3显示的数据看,16—35岁这一年轻组与36岁以上年长组相比,年轻组的政治权力取向似乎较弱,他们对那些象征政治权力的职业(如“市长”、“政府部长”、“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等)不像年长组那样看好,他们给予这些职业的职业声望分均低于36岁以上组。其次,年轻组对那些虽然有较高科学知识和较高技术复杂性,但收入较低的职业,评价也不像年长组那样高,如其对“大学教授”、“社会科学家”、“翻译”、“作家”的评分均低于年长组。此外,虽然社会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年轻人多是“追星族”,对此忧心忡忡者不少,但表3中的数据却告诉我们,他们对“歌唱演员”和“影视剧演员”的平均职业评分比36岁以上年长组分别低了7.4分和6.45分,显然,对于这类主要凭天赋取胜的职业他们并不像年长者那样看好。

相比之下,年轻组对那些具有时代特征、需要高新技术的职业则颇为青睐。表3数据显示,他们对“电脑网络系统管理员”、“广告设计师”、“计算机软件设计师”和“私营高科技企业雇员”的职业评价均高于年长组。另外,他们对于伴随改革开放步伐而日渐壮大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外”的非公有制部门职业似乎并无偏见,从表3的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16—35岁年龄组对“私/民营企业家”、“私/民营企业工人”和“私营高科技企业雇员”的评价均高于36岁以上年长组。尤其是将他们对“私立学校教师”(72.36)和“国立中小学教师”(75.83)的评价与36岁以上年长组对这两个职业的评价(前者为70.89,后者为77.93)相比较,更可看出他们对非公有制部门不怀成见:在年轻组的评价中,“私立学校教师”的职业声望只比“国立中小学教师”低3.47分;而在年长组的评价中,前者却比后者低了7.04分。这一结果无疑在向我们昭示,与年长者相比,中国的年轻人是一个较少传统观念、较少权力意识、较多市场取向、较多创新精神和较多风险意识的群体。

表 3

不同年龄群体职业评价差异比较

职 业	16—35 岁组职业声望评分	36 岁以上组职业声望评分	(1) - (2)
	(1)	(2)	
市长	91.28	93.90	-2.62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83.39	87.30	-3.91
政府部长	90.48	91.98	-1.50#
税务管理人员	83.45	85.86	-2.41
工商管理人员	76.13	77.99	-1.86
党政机关小车司机	68.01	71.58	-3.57
社会科学家	82.77	84.59	-1.82
国立中小学教师	75.83	77.93	-2.10
编辑	77.94	81.00	-3.06
大学教授	88.55	91.14	-2.59
翻译	83.82	85.69	-1.87
作家	80.20	83.92	-3.72
播音员	78.30	80.39	-2.09
影视剧演员	74.39	80.84	-6.45
歌唱演员	75.79	83.19	-7.40
银行职员	77.50	80.18	-2.68
殡仪馆工人	51.48	54.05	-2.57
电脑网络系统管理员	78.23	76.46	+1.77
广告设计师	78.07	75.78	+2.29
计算机软件设计师	84.68	82.84	+1.84
私立学校教师	72.36	70.89	+1.47#
私营高科技企业雇员	74.89	72.18	+2.71
私/ 民营企业企业家	79.56	78.01	+1.55#
私/ 民营企业工人	44.48	42.30	+2.18
商店售货员	51.96	50.04	+1.92
保姆	38.16	36.03	+2.13
国有大中型企业工人	49.02	46.30	+2.72
集体企业工人	44.02	41.76	+2.26
调查人数(人)	1044	1544	2588

说明: 所有差异均在 .05 水平上显著, 除了那些带有“#”号者。

2 不同受教育群体职业评价比较

表 4 是不同教育程度被调查者的职业声望评价比较, 其中高中以下组中包括中专、中技学校毕业生在内, 大专以上组中包括接受成人高等教育者(如电大、夜大、函大)在内。

从表 4 显示的情况看, 总的来讲, 教育水平较低的高中以下组成员的职业声望评价普遍高于教育水平较高的大专以上组成员。在调查问卷列出的全部 69 个职业中, 高中以下组成员对 39 个职业给出了明显高于大专以上组的声望评分。

唯独例外的是对“私/ 民营企业企业家”、“私营高科技企业雇员”、“证券公司职员”和“广告设计师”这 4 个职业, 大专以上组给出了明显高于高中以下组的评分。如果对这 4 个职业的共同特征作个概括, 那么第一, 这 4 个职业都是自改革开放之后才涌现(或再现)出来的需要较高专业

知识方能胜任的职业；第二，这些职业的任职者大都属于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外成员。也就是说，在中国，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市场取向越强，对专业知识的偏好越强，受传统所有制观念的束缚越弱。

表 4 不同受教育群体职业评价差异比较

职 业	高中以下组声望评分(1)	大专以上组声望评分(2)	(1)-(2)
国立中小学教师	78.09	75.15	+2.94
检察官	88.71	85.71	+3.00
文化个体户	68.98	66.95	+2.03
编辑	80.61	78.15	+2.46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86.72	83.84	+2.88
社区服务人员	57.25	55.34	+1.91
殡仪馆工人	54.51	50.00	+4.51
银行职员	79.90	77.53	+2.37
国有小企业厂长	77.60	73.15	+4.45
翻译	86.32	82.47	+3.85
公共汽车司机	59.85	55.89	+3.96
宾馆服务员	54.15	49.91	+4.24
影视剧演员	80.48	74.12	+6.36
歌唱演员	82.08	76.84	+5.24
商店售货员	51.88	49.00	+2.88
机械工程师	77.41	73.33	+4.08
党政机关小车司机	71.50	67.56	+3.94
农民	45.54	43.06	+2.48
播音员	80.92	76.97	+3.95
法官	89.49	85.85	+3.64
警察	78.25	71.75	+6.50
大学教授	90.92	88.41	+2.51
作家	83.69	79.90	+3.79
护士	64.81	62.51	+2.30
工商业个体户	66.42	64.22	+2.20
集体企业工人	43.51	40.87	+2.64
党政机关一般干部	74.80	70.27	+4.53
个体户雇工	39.04	34.89	+4.15
乡镇企业工人	45.29	42.49	+2.80
市长	93.56	91.40	+2.16
大企业会计	74.09	72.06	+2.03
运动员	76.00	72.23	+3.77
私/民营企业工人	43.97	41.72	+2.25
企事业单位政工干部	68.66	62.71	+5.95
高科技企业工程师	86.35	84.71	+1.64
空中小姐	78.76	76.27	+2.49
国有大中型企业工人	48.30	45.42	+2.88

职 业	高中以下组声望评分(1)	大专以上组声望评分(2)	(1)-(2)
公共汽车售票员	49.72	46.68	+3.04
环卫工人	46.22	43.96	+2.26
私/民营企业企业家	77.82	80.29	-2.47
证券公司职员	71.47	73.70	-1.96
广告设计师	76.13	77.82	-1.69
私营高科技企业雇员	72.50	74.91	-2.41
调查人数(人)	1690	885	2575

说明:所有差异均在.05水平上显著。

3. 不同地区职业评价比较

表5是中国东、中部地区大城市及东南沿海地区部分开放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海口、厦门、大连、杭州、青岛、常州等23个城市)及重庆与其他40个城市(包括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会在内)被调查者职业声望评价的比较。这一分析基于的假设是:中国的地区概念不是一个简单的空间概念,而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时间概念。东、中部大城市与沿海开放城市由于较早实行开放政策、较早引入市场机制,因而这些城市的居民对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有着更多的认识与更大的承受力,其价值观念的转变较之西部城市/中小城市居民也更快。

表5 东、中部大城市/发达城市与西部城市/中小城市居民职业评价差异比较

职 业	大城市及沿海开放城市(1)	西部/中小城市(2)	(1)-(2)
私立学校教师	73.05	70.61	+2.44
私营高科技企业雇员	75.08	72.28	+2.80
私/民营企业企业家	80.34	77.56	+2.78
投资公司经理	83.94	79.49	+4.45
工商业个体户	67.17	64.88	+2.29
乡镇企业工人	45.80	43.51	+2.29
政府部长	92.44	90.80	+1.64
党政机关一般干部	75.47	72.13	+3.33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86.93	84.96	+1.97
饭店厨师	62.24	59.70	+2.54
空中小姐	76.12	79.06	-2.94
公共汽车售票员	47.14	49.64	-2.50
殡仪馆工人	50.06	54.68	-4.62
公共汽车司机	57.28	59.12	-1.84
保险公司职员	65.49	68.59	-3.10
邮递员	55.48	61.24	-5.76
自然科学家	83.35	86.42	-3.07
社会科学家	82.72	84.54	-1.82 #
国立中小学教师	75.46	77.99	-2.53
播音员	78.12	80.34	-2.22
导游	69.64	72.89	-3.25
调查人数(人)	945	1643	2588

说明:所有差异均在.05水平上显著,除了那些带有“#”记者。

表 5 的数据说明分析所依据的假设基本成立。东、中部地区大城市及沿海城市居民职业声望评分明显低于中小城市的职业多为传统职业；而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涌现出来的市场色彩较浓的新兴职业，东、中部地区大城市及沿海城市居民则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他们对“私立学校教师”、“私营高科技企业雇员”、“私/民营企业企业家”、“工商业个体户”、“乡镇企业工人”和“投资公司经理”的评价均高于西部城市/中小城市居民。

不过，从大城市及沿海开放城市居民对“政府部长”、“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和“党政机关一般干部”的评分普遍高于中小城市居民来看，职业所拥有的政治权力以及控制社会资源的能量也是他们评价职业声望时较为看重的标准。这一点似乎颇让人感到费解，然而，它却从另一个角度再次揭示了中国地区概念中的“时间”内涵。中国的经济改革，从体制上来说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其实质就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所谓“资源”可分为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两种。有形资源如土地、计划物资等；无形资源则是一些经营特许权，如房地产经营权、某类物品的进出口权、股票上市权等等。在中国，代行资源管理与配置大权的是各级党政机关，由于转型时期中权力约束机制的不健全，致使变质的权力之手得以介入资源配置的全过程而从中渔利。这种权力市场化现象无疑在开放较早的地区表现得更突出、更明朗，因此，这些地区的居民对此有着更深刻、更透彻的认识与体会，并在职业评价中反映出来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四、中国城市居民的择业取向

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与趋势不仅可以从人们的职业声望评价方面进行考察，而且可以从人们的择业取向上反映出来。1983 年林楠与谢文在北京市所做的职业声望研究结论显示，在中国，人们的最终目标是在国有或集体所有制部门中获得一个工作 (Lin and Xie, 1988)。那么今天，这一结论还能继续成立吗？在笔者 1999 年对全国 63 个城市居民进行的抽样调查中，所有被调查者都被要求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您能够重新选择，那么您将选择从事什么职业？”这是一道开放题，没有给出任何限定答案（虽然不排除回答者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问卷中测量职业声望时所列职业的影响）。根据回答者的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进行分组，可以制定表 6。

表 6 不同受教育群体及不同政治面貌者未来择业取向

择业取向排序	初中以下	高中/中专/中技等	成人教育(夜大/函大等)	全日制大专/大学以上	中共党员	非中共党员
第一位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11.8%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11.2%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13.6%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11.4%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14.4%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10.3%
第二位	工商/税务管理人员 6.3%	工商/税务管理人员 6.8%	电脑工程师 7.7%	电脑工程师 10.1%	工商/税务管理人员 6.6%	电脑工程师 6.3%
第三位	私/民营企业企业家 5.8%	法官 5.8%	律师 7.2%	私/民营企业企业家 6.5%	电脑工程师 6.1%	私/民营企业企业家 6.3%

择业取向 排序	初中以下	高中/ 中专 / 中技等	成人教育 (夜大/ 函大等)	全日制大专 / 大学以上	中共党员	非中共党员
第四位	法官 5. 8%	电脑工程师 5. 8%	工商/ 税务 管理人员 6. 4%	工商/ 税务 管理人员 6. 3%	律师 5. 4%	工商/ 税务 管理人员 5. 6%
第五位	医生 4. 6%	律师 5. 5%	法官 5. 1%	大学教授 5. 5%	法官 5. 3%	法官 5. 3%
第六位	检察官 4. 6%	私/ 民营 企业家 5. 3%	私/ 民营 企业家 5. 1%	自然科学家 5. 1%	医生 5. 3%	律师 5. 0%
第七位	党政机关 一般干部 4. 4%	医生 4. 6%	医生 4. 8%	律师 4. 9%	检察官 4. 7%	医生 4. 1%
第八位	律师 3. 7%	检察官 4. 0%	检察官 4. 0%	记者 4. 5%	私/ 民营企业 家 4. 4%	国立中小 学教师及 检察官 各占 3. 7%
调查样本(人)	655	944	375	493	830	1629

说明: 1. 表中“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包括选择“ 市长” 及“ 政府部长” 者在内。

2. 表中“ 电脑工程师” 实为选择“ 电脑网络工程师” 和“ 计算机软件设计师” 两项之和。

3. 表中“ 私/ 民营企业家” 包括选择“ 工商业个体户” 者在内。

4. 表中“ 工商/ 税务管理人员” 实为选择“ 工商管理” 与“ 税务管理” 两项之和。

表 6 是不同教育程度被调查者与不同政治面貌被调查者未来择业取向前 8 位的排序。不难看出, 虽然在各群体的选择中, 国有部门的职业仍然受到青睐。但是, 明显属于传统计划经济“ 体制外” 的“ 私/ 民营企业家” 也开始被各群体看好。在“ 初中以下”、“ 全日制大专/ 大学以上” 以及“ 非中共党员” 这 3 个群体的未来择业取向中, “ 私/ 民营企业家” 均排在第三位; 而在“ 高中/ 中专/ 中技” 和“ 成人教育(夜大/ 函大等)” 这两个群体的择业取向中, “ 私/ 民营企业家” 被排在第六位; 即使在“ 中共党员” 这一中国最高政治地位群体的重新就业选择中, “ 私/ 民营企业家” 也被排在了第八位。显然, 经历了 20 年的改革开放后, 人们已不再把谋职的最终目标锁定在国有或集体所有制部门。市场虽然充满风险, 却也孕育着无限希望, 对有志者来说, 那已成为施展身手创一番伟业的理想所在。

不过, 表 6 中最为抢眼的还是各群体未来择业的第一取向, 无论按教育程度划分, 还是按政治面貌划分, 排在首位的无一例外都是“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仅如此, 在表 1 的职业声望评价中, “ 大学教授”(90. 1) 是得分仅次于“ 市长” 和“ 政府部长” 位居第三的职业, 但是在表 6 展示的中国城市居民未来择业取向中, 除“ 全日制大专/ 大学以上” 群体将其列为第五位外, 其他群体对其并不看好。倒是职业评价明显在其之下的“ 工商(77. 3)/ 税务(84. 9) 管理人员” 被人们普遍看好(在“ 初中以下”、“ 高中/ 中专/ 中技等” 以及“ 中共党员” 群体中, 列居第二位; 在“ 成人教育”、“ 全日制大专/ 大学以上” 以及“ 非中共党员” 群体中列居第四位)。这一结果分明是在

告诉我们：在中国，权力不仅是人们进行职业评价的重要标准，而且是人们重新选择职业时予以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代社会中，社会流动产生的条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二是社会开放性的增加。社会结构变化对流动有直接的影响，其变化所引起的位置增减将导致社会成员在不同社会位置上的新的分布；社会开放性的增加则会减少流动的障碍，从而为社会成员变换其社会位置提供更多的机会，对流动产生间接影响。改革的深入发展，不仅导致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使从业者得以在经济发展与所有制结构调整所创造出的大量新的社会位置中进行流动，而且导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种种限制人们自由流动的身份制壁垒（许欣欣，2000）的瓦解，为广大从业者重新择业提供了远较改革前更多的机会。然而，具体到“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这一职业来说，随着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构的调整，其对任职者的需求量并未增多，而是在逐渐减少。因此，表6所展示的各群体均将未来职业的第一选择定为“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无疑与现实可能相悖，使得我们有理由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尤其是“非中共党员”群体中也有10.3%的人将“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作为重新择业的第一取向，则更令人困惑难解。鉴于此，有理由作出这样的推断，即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恐怕未必是出于真正的行为动机，或许只是一种逆反情绪或权力情结的反映而已。对这些人来讲，这一取向与其说是务实，倒不如说是在务虚。

那么，谁有可能是在真正务实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表7。表7是关于不同年龄群体未来职业选择的排序。虽然从调查样本总体看，排在第一位的仍然是“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见表7最右边一列），但是，当所有被调查者按年龄大小分成“16—30岁”、“31—45岁”和“46岁以上”3个组时，差异便显示出来。从3个不同年龄群体的比较看，16—30岁这一最年轻群体的政治权力取向最弱，与其他两个较年长群体相比，他们的第一位选择不是“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而是需要完完全全凭尖端科学知识和复杂技术水平、必须投入大量人力资本后方能胜任的“电脑工程师”（即“电脑网络工程师”或“计算机软件设计师”）。不仅如此，在他们的第八位选择中，被其他群体普遍看好而位居次席、无需付出太多人力资本、单凭手中权力即可为自己大行方便的“工商/税务管理人员”竟然榜上无名。之所以会这样，根本原因恐怕在于相对来讲这是一个缺乏社会记忆的群体，他们从懂事起便开始接受市场经济——尽管尚不规范——的熏陶，因而更能感受到时代的脉搏，而较少传统观念的印痕与束缚。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与工业时代不同，信息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生活在这样一个变革时代的年轻人，他们已经不能接受森严的等级结构、呆板的中层管理、僵化的论资排辈和循序渐进的升迁程序。因此，对他们来讲，“为官”不再可能是终极目标，他们梦寐以求的也许是凭借自身知识与能力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①、乔布斯^②、杨致远^③……因为纵观人类历史，除了体育和表演艺术外，找不到一个领域可以像信息产业这样反复地让“少年选手”成为领袖和大师。这是一群刚刚进入或即将进入劳动市场的生力军，应该说，他们的选择才最有可能是在务实，他们的择业取向才更能反映出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趋势。

当然，这里无意否认31—45岁组和46岁以上组这两个年龄群体未来择业取向的务实性。

① 世界著名软件公司“微软公司”创始人，成为世界首富时不过40岁。

② 世界著名计算机公司“苹果公司”创始人，19岁创办苹果公司。当其创办的公司上市后，股票价值达到近18亿美元，超过福特汽车公司时，年方24岁。

③ 世界著名网络公司“雅虎公司”创始人之一，成为亿万富翁时年仅27岁。

表 7

不同年龄群体未来职业选择排序

择业取向排序	16—30 岁	31—45 岁	46 岁以上	样本总体
第一位	电脑工程师 11.1%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12.2%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14.4%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11.8%
第二位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8.4%	工商/税务管理人员 6.3%	工商/税务管理人员 7.0%	电脑工程师 6.1%
第三位	私/民营企业家 5.4%	私/民营企业家 5.9%	法官 6.0%	工商/税务管理人员 5.9%
第四位	律师 5.1%	律师 5.5%	私/民营企业家 5.7%	私/民营企业家 5.6%
第五位	法官 4.7%	法官 5.3%	医生 5.2%	法官 5.3%
第六位	国立中小学教师 4.4%	电脑工程师 5.2%	律师 4.7%	律师 5.1%
第七位	警察 4.1%	医生 5.0%	检察官 4.1%	医生 4.5%
第八位	检察官 3.7%	检察官 3.8%	国立中小学教师 4.1%	检察官 3.9%
调查样本(人)	701	1004	772	2477

说明: 同表 6。

事实上, 他们的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其真正的行为动机。这两个群体之所以将“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和“工商/税务管理人员”作为未来择业的第一二位取向, 显然与其生命历程直接相关。长期生活在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受官本位的影响自然更多。另一方面, 则反映出他们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特征有着比年轻人更深刻的理解与认识,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不可能一蹴而就, 漫长的转型过程中, 由于权力约束机制的软化, 致使变质的权力之手介入资源分配。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事实, 20 世纪 80 年代, 在价格双轨制的作用下, 中国曾兴起过规模空前的“公司热”和“炒批文热”; 进入 90 年代以后, 中国又相继出现了几大投机行业: 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这几大“热”和几大投机行业的兴起, 使得一部分人可以依靠权力和资本的投入, 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在这几次资本原始积累的高潮中, 中国涌现了一大批百万、千万乃至亿万富翁, 其持续时间之短, 积累速度之快, 集聚财富之巨, 堪称世界之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与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 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中相当一部分是以国有资产为掠夺对象, 是部分特权阶层和贪官污吏这些社会资源管理者与各种不法分子相勾结, 以各种方式巧取豪夺自己看守的社会财富, 使之从国库“和平”转移到私囊, 这种转移既不需要借助“火和剑”去完成, 也没有赤裸裸的暴力和血腥味。正因为如此, 它才更有隐蔽性, 更具诱惑力。对于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和工作的人来讲, 要在市场经济中创造财富是件陌生而艰苦的事情, 但是, 若有可能进入权力部门, 成为特权在握的任

职者,从而可以轻而易举把手伸进“人民财产”这只自己充当看守人的口袋里获取财富,“近水楼台先得月”,又何乐而不为?当然,这里丝毫无意贬低那些立志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施展抱负者的行为动机,毕竟,“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更何况变迁时期的中国正在为有志者搭建可上演最雄壮、最震撼人心剧目的舞台。

五、总结与讨论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人们职业声望评价的变化和未来择业的取向反映出中国社会结构深层的变动过程。这种变动主要沿着两条轴线在运行:一条是市场化的轴线。在体制转轨过程中,一方面,市场适应力强的职业越来越被人们所看重。这一点既在人们不同时期对传统“体制外”职业评价的上升(如“私/民营企业家”、“文化个体户”、“工商业个体户”等)中反映出来,又在人们的未来择业取向中进一步体现,如“私/民营企业家”已成为各群体重新择业时普遍看好的职业。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风险的增加,有稳定保障的职业也比以前更受青睐;另一方面,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国社会开始了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过程。然而,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作用,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只能称之为“模拟市场经济体制”(何清涟,1998)。不同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源配置的功能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承担,目前的中国由于种种无法规避的历史原因,资源配置的功能仍然主要由政府部门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承担。由于转轨时期权力约束与监督机制的缺位,使得变质的权力之手得以方便地介入资源分配,致使中国社会至今仍处于“人治的法制社会”,而未真正成为“法治的法制社会”。因此,控制与管理国有资产的权力部门的职业(如“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税务管理人员”和“工商管理人員”等)迄今仍然被人们视为有利的资源获得位置。

另一条是产业结构的轴线。我们正处在一个世纪交替的时代。纵观历史,人类社会发 展至今经历了三个文明的时代,若按产业结构划分,可以分为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是实物经济,工业经济是货币经济,知识经济是信息经济。今天,世界经济正处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的时代。作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变革中表现得并不是太落伍。在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中,各种与知识和高新技术紧密联系的智能型职业已开始领导中国职业变迁与社会流动的新潮流。不仅反映时代特征的“电脑网络工程师”、“高科技企业工程师”、“计算机软件设计师”等职业得到了人们高度评价,而且在人们的未来择业取向中,这些职业也已成为许多象征中国未来的青少年的首选职业。

毋庸置疑,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有本质的区别。二者之间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工业经济是迂回经济,而信息经济是直接经济。先进的技术必然与先进的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相联系。在以资本为核心的迂回经济向以信息(知识)为核心的直接经济转变过程中,伴随企业组织形式从注重严谨、规矩、规范的僵化科层制向以敏感性或应变能力(Sensitivity)为特征的迅速适应新技术与新环境的“学习性组织”(Learning Organization)和“活的组织”(Living Organization)的转变,“万维网前人人平等”的神话将使整个社会结构从单向链式联结的金字塔型垂直结构转变为多向联结的平行网状式结构。作为知识的载体,人在知识经济中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将成为财富的源泉。恰如世界银行副行长瑞斯查德所云,当今世界,知识是比原材料、资本、劳动力、汇率更重要的经济因素(《参考消息》,1998)。知识与生产之间关系的改变,势必动摇旧有经济与政治生活的基础,政治权威将逐渐

让位于知识权威。因此,可以预期,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随着法制建设的逐步健全与完善,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将日益与时代变迁趋同。未来的中国,人们将更侧重于人力资本的投入,教育和收入在决定人们职业评价与职业选择中所起的作用将稳步上升,政治权力的作用将逐步下降。只有了解了这种变动趋向,才能在 21 世纪更好地把握住机遇,迎接时代的挑战。

附录 A

中国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由于任何量表都不可能将所有职业囊括在内,于是,对职业声望的理解与测量还导致了社会经济地位、权威与权力以及其他有关地位测量尺度的发展。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邓肯用诺斯与海特量表中 50 个职业的声望,配以每种职业的平均教育程度与收入,求得职业声望、教育和收入三者之间的回归方程,据此得到可用于推算每一职业声望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oeconomic index,简称 SEI)(O. D. Duncan, 1961)。在此不妨按照邓肯的方法尝试建构中国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由于无法从国家统计局获得每一职业的平均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权且以笔者 1999 年调查样本的平均教育程度和被调查者接受调查时的上月平均收入作为替代,职业声望也以 1999 年的调查数据为准。由此求得中国“教育—收入指数”(education-income index,简称 EII)的回归方程如下:

$$EII = 5.622 + 15.816(\text{教育}) + 0.763(\text{收入})$$

这一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模型的解释力为 76.5% ($R^2 = 0.765$),教育与收入的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 0.81 和 0.21。声望与教育和收入之间的零序相关系数分别为 0.85 和 0.37。邓肯关于美国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EI)的解释力为 83%(1961),其地位与教育的相关系数为 0.85,地位与收入的相关系数为 0.84。因此与之相比,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国,人们对职业声望的评价受教育的影响大于受收入的影响。这一结果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的收入差距是受到限制的,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由于分析时所用的月收入这一预测指标未能将国家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任职者在收入之外享受的住房等福利待遇计入,尤其是未将许多人工薪收入之外的“灰色收入”计入,因而降低了收入的影响效果。

那么,只考虑教育与收入的作用就足以刻划出中国的职业地位吗?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不止一次看到了人们评价职业声望与重新设定择业取向时对职业的政治权力特征所给予的特别关注。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官本位”传统的国家。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国家领导人选择了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要求“法治”相反,计划经济本质上讲属于必须靠“人治”来保证其有效运转的命令经济。于是,一套以行政序列为基础、纳各行各业于其中的“官本位制”得以在新中国推行。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领域的扩大,资源获得渠道日益多元化,官本位制的资源再分配功能有所减弱,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只能称之为“模拟的市场经济体制”,它和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相同,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源配置的功能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承担,而中国由于种种无法规避的历史原因,目前的资源配置功能却是由政府部门这只“看得见”的权力之手在承担。因此,在构筑中国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时,需要将权力因素考虑在内。

如果将权力变量引入^①,那么,根据教育、收入、权力(power)3个预测指标重新构成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PEI)的回归模型将如下所示:

$$PEI = 15.148 + 10.621(\text{教育}) + 0.711(\text{收入}) + 4.13(\text{权力})$$

这一模型的解释力为82.6% ($R^2 = 0.826$),与仅用教育和收入解释的EII模型相比,解释力提高了6.1%。教育、收入、权力的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0.54、0.19、0.37。不难看出,由于权力变量的进入,教育对声望的贡献明显下降。因此,“权力”不仅可视为影响职业声望的独立变量,而且有理由将其视为教育与职业声望之间的一个中介变量。教育水平为人们进入有权力的职业提供可能(教育与权力之间的零序相关为0.80),而职业所具有的权力特征则决定该职业的声望。

相比之下,含教育、权力、收入3个因素在内的PEI模型更适于用作推算当前中国职业地位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附录 B

1999年中国63个城市居民抽样调查问卷中A、B卷职业类别明细

A卷职业:法官、警察、大学教授、作家、护士、工商业个体户、政府部长、集体企业工人、国有大中型企业厂长/经理、党政机关一般干部、出租汽车司机、记者、个体户雇工、工商管理人員、私/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工人、市长、电脑网络系统管理员、保姆、大企业会计、运动员、建筑业民工、饭店厨师、证券公司职员、广告设计师、保险公司职员、社会科学家、私/民营企业工人、企事业单位政工干部、高科技企业工程师、空中小姐、国有大中型企业工人、公共汽车售票员、环卫工人、计算机软件设计师。

B卷职业:律师、国立中小学教师、检察官、私立学校教师、医生、文化个体户、编辑、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社区服务人员、股份制企业工人、国有小企业工人、饭店招待、邮递员、导游、自然科学家、税务管理人员、殡仪馆工人、银行职员、私营高科技企业雇员、国有小企业厂长、翻译、公共汽车司机、私/民营企业、房地产开发经营商、电脑网络工程师、宾馆服务员、影视剧演员、歌唱演员、商店售货员、三资企业职员、机械工程师、党政机关小车司机、农民、投资公司经理、播音员。

参考文献:

阿尔温·托夫勒,1991,《权力的转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边燕杰、高家玉,1999,《走向二十一世纪的香港职业声望:大学生对职业的评价及分析》,提交“第二届华人社会阶层研究研讨会”论文。

《参考消息》,1998年6月30日。

① 分析中,权力变量的赋值通过专家调查法而确定。具体做法是:第一,选择20位对中国社会有较深入了解的专家,专家的学术资格确定为博士或副研究员(副教授)以上;第二,请专家分别就15个去除所有制因素的主要职业类别所拥有的权力进行评分,分值规定在0—5分之间,0分表示权力最小,5分表示权力最大;第三,将专家意见汇总后求各职业类别的权力平均值,得到如下结果:“党政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4.9分,“企业负责人”4.4分,“党政机关科级以下干部”3.81分,“企业一般干部”3.2分,“企业技术人员”2.3分,“其他专业人员中(如卫生、文化事业)”2.19分,“大学教师”2.06分,“中小学教师”1.94分,“科学技术研究人员”1.8分,“退休干部”1.63分,“个体劳动者”0.9分,“工人”0.75分,“无固定职业者”0.44分,“退休工人”0.44分,“农民”0.37分;第四,将专家评议结果通过加权代入量表中各职业,据此构造模型。

- 陈婴婴, 1995,《职业结构与流动》, 东方出版社。
- 何清涟, 1998,《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 今日中国出版社。
- 李路路、王奋宇, 1992,《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 浙江人民出版社。
- 马特拉斯, 1990,《社会不平等、阶层化与社会流动》, 桂冠出版社。
- 许嘉猷, 1986,《社会阶层化与社会流动》, 三民书局。
- 许欣欣, 2000,《转型时期的中国结构变迁与社会流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张华葆, 1987,《社会阶层》, 三民书局。
- 折晓叶、陈婴婴, 1995,《中国农村“职业—身分”声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Bendix, R. & S. M. Lipset (eds), 1953, *Class, Status and Power*, New York: Free Press.
- Blackburn, M. L. & D. E. Bloom, 1987, “Earnings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3.
- Blaug, P. M. & O. D.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 Blaug, P. M. & D. Q. Ruan,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Urban China and America”,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Vol. 9.
- Duncan, O. D., 1961, “A Socioeconomic Index for all Occupations”, in *Occupations and Social Status*, ed. by A. J. Reiss & New York: Free Press.
- Erikson, Robert & John H. Goldthorpe, 1987, “Commonality and Variation in Social Fluidity in Industrial Nation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
- Featherman, D. L. & R. M. Hauser, 1978, *Opportunity and Change*, New York: Academic.
- Featherman, D. L.; F. L. Jones and R. M. Hauser, 1975, “Assumptions of Mobilit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 4.
- Ganzeboom, H. B. G. et al., 1992, “A Standard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 21.
- Ganzeboom, H. B. G.; R. Luijckx & D. Treiman, 1989,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Research in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Vol. 8, edited by Arne L. Kalleberg,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Grasmock, Harold G., 1976, “The Occupational Prestige Structure: A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pproach”,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 17.
- Grusky, D. B. & R. M. Hauser, 1984, “Comparative Social Mobility Revisite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9.
- Hall, John & D. Caradog Jones, 1950, “Social Grading of Occup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
- Hatt, Paul K., 1950, “Occup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Vol. 55.
- Hauser, R. M. & D. B. Grusky, 1988, “Errors in Slomczynski and Krauze’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3.
- Hazelrigg, L. E. & M. A. Garnier, 1976,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1.
- Hodgson, Robert W., 1981, “The Measurement of Occupational Statu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 10.
- Hout, M., 1988, “More Universalism, Less Structural Mo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3.
- Inkeles, A. & Peter H. Ross, 1956, “National Comparisons of Occupational Presti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61.
- Jackson, E. F. & H. J. Crockett, Jr., 1964,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9.
- Konrad, G. & Ivan Szelenyi, 1991, “Intellectuals and Domination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Social Theory for a Changing Society*, Edited by Pierre Bourdieu and James S. Coleman.
- Lin, N. & Y.-J. Bian, 1989, “Status Attainment in a Chinese Labor Struct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

- 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 Atlanta (August 1988).
- , 1991, “Getting Ahead of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7.
- Lin, N. & W. Xie, 1988,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3.
- Lipset, S. M. & R. Bendix, 1959,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pset, S. M. & H. L. Zetterberg, 1956 “A Theory of Social Mobility,” *Transactions of the Third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Vol. 3.
- Mach, B. W. & Włodzimierz Wsolowski, 1982, *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Structure*, London: Ractedge and Kegan Paul.
- Miller, S. M., 1960 “Comparative Social Mobility,” *Current Sociology*, Vol. 9.
- Nee, Victor, 1991, “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6.
- Parish, W. L., 1981, “Egalitarianism in Chinese Society”,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30.
- , 1984,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edited by J. L. Wat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goff, N., 1953 *Recent Trends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Glencoe, IL: Free Press.
- Ślomyński, K. M. & T. K. Krauze, 1987, “Cross-National Similarity in Social Mobility Patter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2.
- Sobel, M. E.; M. Hout & O. D. Duncan, 1985, “Exchange Structure and Symmetry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9.
- Szelenyi, I., 1982, “The Intelligentsia in the Class Structure of State-Socialist Socie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8.
- Szelenyi, S., 1987, “Social Inequality and Party Membership”,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2.
- Treiman, D. J., 1977,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Turner, J. H., 1984, *Societal Stratification—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alder, A. G., 1989, “Economic Reform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Tianjin, 1976 and 1986”, Revised Preprint of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s”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ay 1988).
- , 1995,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0.
- Walder, A. G.; Zhou Lu; P. M. Blau; D. Ruan, & Z. Yuchun, 1989 “The 1986 Survey of Work and Social Life in Tianj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Research on Politic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Cambridge MA, Working Paper Series.
- Weber, Max, 1958,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hyte, M. K., 1984, “Sexual Inequality under Socialism”,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edited by J. L. Wat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hyte, M. K. & W. L. Parish, 1984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right, E. O., 1984,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Class Structure”, in *The Debate on Classes*, edited by Erik Olin Wright.
- Xie, W. & N. Lin, 1986 “The Process of Status Attainment in urba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New York (August 1985).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博士
责任编辑：张志敏